

田野中的經史學家

——顧頡剛學術考察事業中的古跡古物調查活動

車行健

摘要

顧頡剛雖以考辨古史聞名於世，但在其學術生涯中，走出書齋，邁向田野的學術考察活動一直都是他非常注重且身體力行的。從 1918 至 1945 年間，他至少參與了 66 次的考察活動或帶有考察性質的旅遊活動，尤以 1929 年秋天從廣州北返北平任職燕京大學歷史系，至 1937 年七七抗戰前夕避日禍遯走西北的八年間，可說是他學術考察事業達到最高峰的時候，他在這八年間一共親身參與了 20 次的考察活動，平均一年有 2.5 次到田野考察遊歷的機會。

在這段期間，他的學術考察事業重心已由早年的民俗考察轉移至古跡古物的調查及邊疆史地的考察。本文的重點在於探討顧頡剛學術考察事業中的古跡古物調查活動，除了詳細考察顧頡剛從事這項調查活動的動機、經過及具體考察細節外，還分別從：一、文物與文獻資料的調查與蒐集；二、考察成果的展示與公佈；三、有意識地將古跡古物調查提升為一門專業的課程；四、喚醒社會對古跡文物的重視；五、與經史古籍相印證等五個面向，來闡述及評估其所從事的古跡古物調查活動之成就與貢獻。

關鍵字：顧頡剛、經史學家、學術考察、古跡古物調查、禹貢學會

2009/03/02 投稿成功，2009/05/14 審查通過，2009/06/25 修訂稿收件。

* 車行健現職為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A Classic-historianinthefields: The ActivitiesofInvestigation of Antiquitiesin Ku Chieh-kang's Career of Academic Exploration

Che Hsing-chien

Abstract

Despite being famous for his work of researching Chinese ancient history, Ku Chieh-kang always laid stress on the activities of academic exploration which had to go out the den and stride towards the fields, and he did practice what he emphasized in his academic life. During 1918 to 1945, he joined the activities of investigation or the trip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vestigation at least sixty-six times; especially, between the autumn of 1929 when he went back to Beijing from Guangzhou to take up a post at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of Yanching University and the eve of July 7th Incident of 1937 when he fled to western-north China to keep away from the battle, his career of academic exploration climaxed in the eight years. He personally participated in investigative activities twenty times in total in that period, that is, he went to the fields to do research two point five times a year on average.

During the period, the focus of his career of academic exploration had transferred from folk research to the investigation of antiquities and frontier history and geography. This paper is aimed at researching the activities of investigation of antiquities in Ku Chieh-kang's career of academic exploration. Besides carefully researching the motive, process, and concrete exploratory details of Ku's investigative activities of antiquities, I am going to elaborate and evaluate his achievements and contribution from the following five aspects: first, the examination and collection of antiquities and bibliographies; second, the display and announcement of investigative results; third, to consciously promote the investigation of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ntiquities to be a professional course; fourth, to awake the society's respect for antiquities; five, to verify by classics, histories, and ancient books.

Keywords: KuChieh-kang, classic-historian, academic exploration,
investigation of antiquities, Yu Gong Society

有一次斯文赫定告訴中國的科學家說：「李希霍芬在中國調查地質總算有鑿空之功了，他的能力與見識都是不可多得的。但是他卻始終不相信，中國的斯文秀才會放棄蓄長指甲，出門坐驕子並帶一個書僮侍候的習慣。」他的意思，就是「田野工作」是歐洲科學家的法門；中國秀才不但不會學，也學不會的。（李濟：序石璋如撰作之《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年表》，頁1。）

一、北平學術圈中的顧老板¹

余英時（1930-）在通讀了《顧頡剛日記》後，不禁為顧頡剛（1893-1980）旺盛的事業心感到驚訝²，余英時在為《顧頡剛日記》所寫的長序中³，首先注意到了顧頡剛在1942年5月31日的日記中所記下的一段自述其心境的話：

¹ 顧頡剛為史學家，此乃無庸置疑者。然其是否為經學家，則似乎並不是那麼確定。即使稱其為經學家，也往往關聯著對顧頡剛或正面或負面的學術評價。前者如楊向奎（1910-2000）肯定其在經學方面的成就，提醒後學「顧先生也是一位經師。」（吳銳：〈疑古時代是怎樣大膽走出的〉，《古史考》〔海口：海南出版社，2003年〕，第5卷，頁467。）後者則如李學勤（1933-）用帶有貶義的態度直斥顧頡剛「只是一個經學家！」（吳銳：《中國思想的起源》〔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卷，頁10-11。）然而不論褒揚或是貶斥，畢竟都是旁人的評論。不如直接回到顧頡剛本人的學術觀點及實際表現，來看看他本人究竟是如何自我定位的。大體來說，顧頡剛的學術歸向仍是史學，而其重點則在中國古史。他對經學及經書的看法也主要從史學及史料的角度來看，如其曾謂「將經書變成歷史」、「把經書也看成一堆史料」（顧潮〔1946-〕：《顧頡剛年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頁260）、「把經學變化為古史學」（顧潮：《歷劫終教志不灰——我的父親顧頡剛》〔以下簡稱《歷劫終教志不灰》，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頁264。）。但他並不因此就不重視經學及經書，他認為欲跳過經學的一重關而直接從經書中整理出古史來，這樣的做法實際上是存著「舍難趨易之心」，他直言是不可能的。（顧頡剛：《顧頡剛讀書筆記》〔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年〕，第4卷，頁2406。）反之，他對經學的研究一直都是很重視的，如其於1939年年底時，寫信給楊向奎，提醒他在經學性質「尚不十分明瞭時，則必須有人專攻，加以分析，如廖平、皮錫瑞然。」而其在1939年1至8月任職雲南大學時，亦嘗任雲大文史系「經學史」課程。（以上俱見顧潮：《顧頡剛年譜》，頁292、296。）他甚至還在1949年國民政府風雨飄搖，人心惶惶之際，仍對經學的前途甚為關心，他甚至感歎道：「現在研究經學人士寥寥可數，只沈鳳荃、張西堂數君，予苟不為，則康、崔之緒即斷。故此後研究工作，必傾向經學，庶清代業績有一碩果也。」（顧頡剛：《顧頡剛日記》〔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7年〕，第6卷，頁401，1949年1月5日記）。由他這些實際的學術表現來看，經學家及經師的稱號，對顧頡剛來說，應該都還算是恰如其分的。退一步來說，即使他不能被視做是一位嚴格意義下的經學家、但他至少也應被看做是從事經學及經書相關研究的「經學研究者」。本文主要側重在顧頡剛對傳統的經史學術的研究，而且亦考慮到他對經學及經書的研究又往往關聯著史學，因此本文標題用「經史學家」這樣的稱號來稱呼他。

² 余英時：《未盡的才情——從顧頡剛日記看顧頡剛的內心世界》（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許多人都稱我為純粹學者，而不知我事業心之強烈更在求知欲之上。我一切所作所為，他人所毀所譽，必用事業心說明之，乃可以見其真相。⁴

回顧顧頡剛一生的事跡，除了個人豐富的學術研究及著作外，他還做了大量的與學術有關的行政事務及週邊活動，包括辦學、辦刊物、成立專業性的學術組織、組織研究團隊進行集體研究活動等。學業事業之外，他尚從事文教事業、商業活動，甚至政治活動，難怪余英時會說他的生命型態從 1930 年代開始，愈來愈接近一位事業取向的社會活動家，流轉於學、政、商三界。⁵

不過顧頡剛的事業心基本上還是表現在學術上，縱使他從事政治活動或商業活動，他的目的還是在支援其學術活動，⁶這點也是余英時所承認的，所以他才會說顧頡剛的事業「都是從學術領域中延伸出來的文化事業」。⁷

顧頡剛的旺盛學術事業心在 1930 年代展露得最為明顯，而其實際的學術事業成就也在這段期間表現得最為輝煌。1929 年他結束廣州中山大學的教職，北上就燕京大學聘，正式揮別了「如沸如羹」般的南方教職經驗⁸，終於回到他「狐死首

2007 年），頁 1-2。

³ 即《未盡的才情》一書，因此序文篇幅較長，余先生徵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同意，另印單行本。

⁴ 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 4 卷，頁 689-690。案：這段話係顧頡剛於 1942 年 6 月 7 日補記於 5 月 31 日的日記中。

⁵ 余英時：《未盡的才情》，頁 2。童書業（1908-1968）之女童教英（1940-）也有類似的看法，她說：「從某種意義上看顧頡剛，不僅是位學者，還是位社會活動家。」見氏撰：《從煉獄中升華——我的父親童書業》（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年），頁 44。

⁶ 在政治活動方面，如顧頡剛曾於 1936 年加入國民黨，但他加入的原因是為禹貢學會募款及為通俗讀物編刊社化解被查封的危機。（以上俱參顧潮：《顧頡剛年譜》，頁 247；余英時：《未盡的才情》，頁 52-53。）直至 1947 年國民黨辦理黨員重登記，顧頡剛因未登記，方始脫離國民黨。（顧潮：《歷劫終教志不灰》，頁 227。）余英時因顧頡剛於 1946 年 11 月被國府選為國民大會社會賢達代表，因此判斷他在 1946 年必已退出了國民黨。（余英時：《未盡的才情》，頁 64。）案：余先生判斷不確。蓋余先生僅依據《顧頡剛日記》，而未參考顧潮《歷劫終教志不灰》一書中所徵引之其他原始史料，以致有此失誤。至於在商業活動方面，則如其於 1943 年與商人合辦大中國圖書公司，目的也是為了推動種種以史學為中心的學術計畫。（余英時：《未盡的才情》，頁 6-7。）

⁷ 余英時：《未盡的才情》，頁 6。

⁸ 「如沸如羹」語見顧頡剛：《辛未訪古日記》（收入葉聖陶〔1894-1988〕編：《開明書店二十週年紀念文集》，北京：中華書店，1985 年），〈序〉，頁 222。案：顧頡剛因生計所迫，於 1926 年 7 月 1 日忍痛接受廈門大學的聘書，南下任廈大國學研究院導師及國文系教授。然因受魯迅（1881-1936）排擠，旋於隔年三月辭職，並於 4 月應傅斯年邀約，就廣州

丘」的中國學術中心北平⁹，直到 1937 年七七事變發生，方又逼使得他倉皇離開北平城。¹⁰這段期間可以說是他個人學術事業與聲望達於頂峰的階段，在那短暫的八、九年中，他在當時的北平學術圈中獲得「顧老板」的戲稱。據他自述：

抗戰前，北平流行著一句話：「北平城裏有三個老板，一個是胡老板胡適，一個是傅老板傅斯年，一個是顧老板顧頡剛。」¹¹

中山大學聘。不過在廣州中大期間，顧頡剛與傅斯年又因二人性格與做事理念之差異而屢生嫌隙，終至決裂。直至 1929 年 2 月，顧頡剛方才脫離廣州，並於同年 9 月正式到燕京大學就職。總計顧頡剛的這一段不愉快的南方經驗一共持續了兩年多。（以上參顧潮：《歷劫終教志不灰》，第四章；顧潮：《顧頡剛年譜》，頁 129、138-140、170-171、176。）關於顧頡剛與魯迅，除可參顧潮：《歷劫終教志不灰》第四章相關敘述外，另可參汪修榮：〈顧頡剛與魯迅的恩恩怨怨〉，《溫故》（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年），第 5 期。此外，顧頡剛在晚年時由於意識到魯迅已成為「文化界之聖人」，他們兩人的糾紛亦必將成為研究者追索的問題，於是便在其日記中有系統地補記了他當年與魯迅交惡的始末。除了有留下忠實的歷史紀錄的目的外，大概也希望能取得類似新聞媒體「平衡報導」的用心在。這段敘述見《顧頡剛日記》，第 1 冊，頁 832-836。至於他與傅斯年交惡事，則請參顧潮：《歷劫終教志不灰》第四章相關敘述；顧潮：〈顧頡剛先生與史語所〉，《新學術之路》（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 年），上冊，頁 91-92；杜正勝（1944-）：〈無中生有的志業——傅斯年與史語所的創立〉，《新學術之路》，上冊，頁 16-22；施愛東（1968-）：〈顧頡剛傅斯年與民俗學〉，《紀念顧頡剛先生誕辰 110 周年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余英時：《未盡的才情》，第一節，〈事業心與傅斯年〉。

⁹ 傅斯年 1928 年 4 月 6 日致胡適信中的戲語，原文為：「頡剛望北京以求狐死首丘。」（見顧潮：《歷劫終教志不灰》，頁 126 引）。顧頡剛對北平的深厚情感與依戀之情，確實達到了令人動容的地步，在 1929 年 5 月初，他回到睽違將近三年的北平後，再也不欲去廣州了，在一封致中山大學同學的信中，他說到：「一到北平舊宅，開了我的書箱，理了我的舊稿，我實在不忍再走了。諸君，這不是我的自私自利，甘於和你們分離，只因北平的許多東西是我的精神所寄託的，我失去了三年的靈魂到這時又找著了，我如何捨得把他丟掉了呢？」（見顧潮：《歷劫終教志不灰》，頁 133 引。）而在 1935 年 12 月 1 日出版的《禹貢半月刊》第四卷第七期的「通訊一束」的編者案語中，顧頡剛亦用深富感情的口吻說到：「一離開北平，歷史材料即有無從接觸之苦，雖是大學林立，而依然文獻無徵；回過頭來看北平，這地方實在太可愛了！可是，北平呀，你肯永遠讓我們愛嗎？你能永遠受我們的愛嗎？幾年來，幾月來，自從四十萬年前的『北京人』頭骨起，以及仰韶陶器，商周甲骨鐘鼎石鼓，漢代竹木簡，晉唐經卷書畫，宋元圖籍，明清檔案，直到近數年的社會調查，眼看它裝箱上車，盈千累萬地南遷了，這個文化中心是被拆散了！」（頁 64）。

¹⁰ 顧頡剛在《西北考察日記·序》曾自云：「……蘆溝橋戰事突起，敵人以通俗讀物之宿憾，欲致予于死地，遂別老父孀妻而長行。」（該書與王樹民〔1911-2004〕《隴遊日記》合輯為《甘青聞見記》，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8 年），引文見頁 4。）據顧潮所述，顧頡剛是在 7 月 21 日晚與家人匆匆道別後上路，但他卻不曾料到，這一去竟是八年多不得返北平。（參顧潮：《歷劫終教志不灰》，頁 184。）

¹¹ 見顧潮：《歷劫終教志不灰》，頁 179 引。

顧頡剛這個說法為他當時燕京大學的學生王鍾翰（1913-）給證實了，他說：

30年代中，當時學術界流行的教授知名度高的，地位也高的，像胡適稱胡老板，顧師稱顧老板。先生既稱老板，學生像我自然是小伙子了！¹²

在當時的北平學術圈中，一位學人之所以能被稱為「老板」，最主要的因素就在於他身邊能夠聚集一班人馬。此所以顧頡剛自己在評論「三個老板」這個說法時也說：「從形式上看，各擁有一班人馬，好像是勢均力敵的三派。」¹³當時顧頡剛不但擁有自己的人馬，而且他還同時擁有三套人馬：燕大歷史系（1936年他出任主任）、北平研究院歷史組（1935年他出任主任，任用了一大批門生），以及禹貢學會。¹⁴由此可知，他這個學術圈中的「老板」稱號不但實至名歸¹⁵，而且與當時的學術霸主胡適（1891-1962）和傅斯年（1896-1950）相較量，亦毫不遜色。¹⁶從今天的角度來看的話，顧頡剛這種表現與作為或許可以稱之為「學術企業家」。¹⁷

¹² 王鍾翰：《王鍾翰清史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3冊，頁1926；第4冊，頁2584。

¹³ 見顧潮：《歷劫終教志不灰》，頁179引。

¹⁴ 參王學典、孫延杰：《顧頡剛和他的弟子們》（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0年），頁65-66。

¹⁵ 顧頡剛廣納人才的作為又為他博得「廣大教主」與「通天教主」的諛稱，參劉惠孫（劉厚滋，1909-1996）：〈顧頡剛先生與冀察古迹考查團〉，《顧頡剛先生學行錄》（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166。案：據《顧頡剛日記》所記，「通天教主」之號當是傅斯年所加諸給他的，不過就顧頡剛本人的認知，這樣的稱號是帶有敵意的，為此他感歎的說：「北大老同學如此嫌忌我，真無法對付。」（第4卷，頁217，1939年4月4日記）

¹⁶ 當然從顧頡剛的角度來看，他可不會那麼認為，因為在實質的學術資源和經費上，他自認為是不如胡、傅二人遠遜。何以然？他說：「胡適是北大文學院長，他握有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美庚款），當然有力量網羅許多人；傅斯年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他一手抓住美庚款，一手抓住英庚款，可以為所欲為。我呢，只是燕大教授，北平研究院歷史組主任，除了自己薪金外沒有錢，我這個老板是沒有一點經濟基礎的。」也正因為如此，這個光棍老板還得常常倒貼自己的薪金、版稅，甚至妻子的私房錢來維持他這些個「學術班子」的運作。（以上俱見顧潮：《歷劫終教志不灰》，頁179。）

¹⁷ 一般來說，這類學術企業家本身須具備相當的學術聲望以及一定程度的奇理斯瑪（Charismatic）人格特質，如此才能吸引追隨者，從而達成聚集人馬的效果。此外還要有爭取學術資源的本事、規劃及執行研究計畫的長才，以及組織人馬從事大規模或集體研究的作為等條件。環視現代人文學界，以筆者淺見，除顧頡剛外，傅斯年與郭廷以（1904-1975）以及西方的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 1902-1985）與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91）等人，大概都是堪稱學術企業家的學人，或至少也可稱做是學術企業家型的學人。（關於布勞岱爾的部分，可參彼得·柏克〔Peter Burke, 1937-〕撰、江政寬譯：《法國史學革命：年

由此或許可以稍微澄清顧頡剛所謂不擅辦事的誤解。長久以來，人們一直對顧頡剛的辦事能力並沒有太多的肯定，尤其在和傅斯年相較量之下，這種印象似乎更顯得突出。甚至在顧頡剛自己學生的心目中也是如此看的，如楊向奎就曾比較顧、傅二人，認為「就辦事的能力說，多謀善斷，長於在亂中求治，頡剛先生遠不如孟真先生」。¹⁸當然，在他早期的文字敘述中確曾流露出「怕管理」、「對於辦事雖有勇氣，卻無興趣」的話語¹⁹，但這不表示他缺乏辦事的幹才。其實顧頡剛若真如楊向奎所說的，辦事能力「遠不如」傅斯年，那又怎麼解釋顧頡剛可以在 1930 年代的北平史學界中，在沒有任何固定經費奧援的情況下，隻力獨撐起三套史學班子，更別說他還辦了許多救亡圖存與啟迪民智的民眾教育事業。²⁰而且這個印象也與顧頡剛的自我認知不同，在 1943 年 8 月 31 日的日記中，他追記了同年 8 月 13 日與好友賀昌群（1903-1973）的談話感想：

渠謂予古史工作已告一段落……至於此後歲用，渠以為宜致力於事業，蓋予有氣魄，能作領導也。²¹

這個看法原是賀昌群對顧頡剛所作的評價，顧頡剛本人不但認可了賀的看法，而且還進一步深入地分析反省自己的缺點在於「開端時規模太大，以致根柢不能充

鑑學派 1929-89》〔臺北：麥田出版公司，1997 年〕，第三章；費正清的部分請參余英時：〈費正清與中國〉，《現代學人與學術》〔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 年〕；傅斯年的部分可參杜正勝：〈無中生有的志業——傅斯年與史語所的創立〉；郭廷以的部分則請參張朋園（1926-）：《郭廷以、費正清、韋慕庭——臺灣與美國學術交流個案初探》〔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1997 年〕。何炳棣（1917-）就曾用「學術企業家」稱呼過費正清。（參氏撰：《讀史閱世六十年》〔臺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2004 年〕，頁 297。）不過有時「學術企業家」跟「學閥」的界限頗難做嚴格的區分，顧頡剛也曾被人罵做「學閥」。但據余英時的分析，顧頡剛對「學閥」的稱號並不反感，因為「他所追求的不是權力（power）顯赫的『學閥』，而是具有廣泛影響力（influence）的『學術界之重鎮』。」（余英時：《未盡的才情》，頁 10-11。）案：余英時的分析，其根據見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 5 卷，頁 58。

¹⁸ 見楊向奎：〈史語所第一任所長傅斯年老師〉，《新學術之路》，上冊，頁 74。

¹⁹ 前者係顧頡剛於 1927 年 2 月 20 日致馮友蘭（1895-1990）信中之語，後者則是他在 1928 年 8 月 4 日致胡適信中語，二者分別轉引自顧潮：《歷劫終教志不灰》，頁 106 與頁 127。這些都是說給別人聽的話，在私下裏他卻說他自己「興奮多而抑制少，故不畏任事。」（1934 年 7 月 31 日記），見《日記》，第 3 卷，頁 218。

²⁰ 童教英對顧頡剛的辦事能力就給予高度的評價，其云：「顧頡剛精力旺盛，活動能力、組織能力極強，其活動範圍廣，……。」（見氏撰：《從煉獄中升華——我的父親童書業》，頁 44。）

²¹ 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 5 卷，頁 139。

實」。²²持平來論，若從事後成敗論英雄的話，則或許顧頡剛所創辦及推動的學術事業（非個人學術成就）對當代中國人文學界的影響不如傅斯年所謂「無中生有的志業」（杜正勝語）來得顯赫，但其最主要的關鍵不完全在兩人的辦事能力的高下差別，而是在於顧頡剛始終無法掌握一長期穩定的學術資源（包含公部門的行政支援及公私部門的經費奧援）。他所創立的禹貢學會是純民間的學術組織，而傅斯年所創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則是公家的學術機關，在動亂不休及民生凋弊的年代中，一私一公的性質就決定了二者或亡或存的命運。²³

二、顧頡剛的學術考察事業

在顧頡剛的眾多學術事業中，其學術考察事業的表現是極為活躍及突出的，粗略地來看，他所參與的學術考察活動大致包含了一、民俗考察；二、古跡古物調查；三、邊疆史地與社會現狀的考察等三個面向。

民俗考察的面向主要集中在 1930 年代以前，也就是他於 1924 至 1926 年間任職北大研究所國學門及 1927 年至 1929 年擔任廣州中山大學教職的期間。在北大工作期間，雖然當時研究所國學門底下有編輯室、歌謠研究會、方言調查會、風俗調查會、考古學會，但顧頡剛作得最多，成績也最突出的還是歌謠研究會和風俗調查會的工作。²⁴而他所參與的民俗考察活動就是在 1925 年春，承風俗調查會之囑托，與容庚（1894-1983）、容肇祖（1897-1997）、孫伏園（1894-1966）、莊嚴（1899-1980）等人赴妙峰山所進行的歷時三天的社會民俗調查。不過，當時

²² 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 5 卷，頁 139。其實顧頡剛的問題不在有無辦事之能力，而是在於性格及人和，其日記中屢有其自我分析反省之語，如云：「予之不能任事，即以予太急切，在予眼中，他人總不能十分努力也。」（1927 年 12 月 31 日記，見《日記》，第 2 卷，頁 117。）又如：「予作事太銳，招人之忌，自在意內。」（1928 年 5 月 22 日記，見《日記》，第 2 卷，頁 166。）又如：「予之為人，在討論學問上極能容忍，而在辦事上竟不能容忍如此。」（1930 年 10 月 1 日記，見《日記》，第 2 卷，頁 444。）又如：「予之性質，亦甚剛愎，故任事以來，對於上司皆感不滿，僅朱驢先先生為例外耳。」（1930 年 11 月 20 日記，見《日記》，第 2 卷，頁 461。）由此可知，他不是沒有辦事之能力，也不是不願任事或畏懼任事，而是太有任事之作為，以致招人嫌忌，再加上個性剛強耿介，「嫉惡若仇」（1935 年 1 月 20 日記語，見《日記》，第 3 卷，頁 299），所以才會遭致不少人事上的阻逆與無端的口舌是非。

²³ 余英時亦就顧頡剛和傅斯年的學術事業的成就作了相當持平客觀的比較，其云：「傅的史語所是國家機構，基礎鞏固；顧的種種『事業』則是私人結合，非有外面的援助便不能長久維持。」（余英時：《未盡的才情》，頁 65。）

²⁴ 顧頡剛：〈古史辨第一冊自序〉，《顧頡剛古史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8 年），第 1 冊，頁 84；顧潮：《歷劫終教志不灰》，頁 83-84。

因受著財力的束縛，正式的調查工作似乎只有這一次。²⁵而在中大時期，他除開設民俗學傳習班，訓練學員從事民俗調查及研究之外，也組織團體去雲南考察少數民族生活。²⁶

古跡古物調查和邊疆史地考察都主要集中在 1930 年代。雖然古跡古物調查在 1930 年前就已有進行，但主要仍是在 1930 年代中大放異彩。（詳參第三節）而邊疆史地考察事業則與他在 1930 年代以後的「歷史地理學的轉向」有著密不可分的关系。鄭良樹（1940-）認為顧頡剛和地理學結上因緣，是他開展第二學術生命的契機。而這一切始於 1931 年初，當時他甫與朱士嘉（1905-1989）合撰成〈研究地方志的計劃〉一文。到了次年秋天，他在燕京大學及北京大學開設「中國古代地理沿革史」課程，主講〈禹貢〉，從此就正式涉入這個領域。而他之所以涉足古代地理，在開始的階段，主要還是為了解決古史的問題。但他逐漸由「玩票」、「客串」的性質，終至正式「下海」。到了 1934 年 2 月，他聯合了譚其驥（1911-1992）及燕大、北大與輔大的學生共同組織禹貢學會，並出版《禹貢半月刊》。這不但表露出他跨足古代地理研究的雄心壯志，而且也標示了他攀向另一個學術事業的高峰。

由此他再沿著古代地理的風勢，並且結合著現實政治的關懷，終將其興趣及觸角延申至邊疆史地的領域內。²⁷

²⁵ 顧頡剛：《妙峰山·自序》，《顧頡剛民俗學論集》（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 年），頁 426；顧頡剛：〈古史辨第一冊自序〉，《顧頡剛古史論文集》，第 1 冊，頁 70-71；顧潮：《顧頡剛年譜》，頁 107；顧潮：《歷劫終教志不灰》，頁 86；容肇祖：〈回憶顧頡剛先生〉，《顧頡剛先生學行錄》，頁 21；鄭良樹：《顧頡剛學術年譜簡編》（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87 年），〈序——論顧頡剛之學術歷程及其貢獻〉，頁 24。

²⁶ 顧潮：《顧頡剛年譜》，頁 156；王煦華（1929-）：〈顧頡剛先生在中山大學〉，《顧頡剛先生學行錄》，頁 42-43；張榮芳（1940-）：〈顧頡剛先生與中山大學〉，《紀念顧頡剛先生誕辰 110 周年論文集》，頁 30。此文又收入氏撰：《秦漢史與嶺南文化論稿》（北京：中華書局，2005 年）。

²⁷ 以上敘述脈絡主要參考鄭良樹：《顧頡剛學術年譜簡編·序——論顧頡剛之學術歷程及其貢獻》，頁 11-14；相關細節則並參顧潮：《顧頡剛年譜·正譜》，頁 192、202、215-216；《顧頡剛年譜·著述目》，頁 477 等之記載。案：鄭良樹將顧頡剛的「歷史地理學的轉向」定於 1931 年，然早在 1928 年秋，顧頡剛即已在廣州中山大學開設「古代地理研究」的課程，並作〈古代地理研究課旨趣〉一文。（參顧潮：《顧頡剛年譜》，頁 160；顧潮：《顧頡剛評傳》〔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5 年〕，頁 122。）由此可知，至遲在 1928 年，顧頡剛即已將其學術觸角延伸至歷史地理學的領域。關於顧頡剛與禹貢學會及《禹貢半月刊》的關係請另參彭明輝（1959-）：《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5 年），頁 143-214。

這三個面向的學術考察活動充分表明了顧頡剛對實地考察學風的重視。在1926年6月出版的《古史辨》第一冊中，顧頡剛發表了那篇具有自傳性質的著名〈自序〉，其中就已顯露出部分的端倪，他自述在北大研究所中：

我始見到商代的甲骨文字和他們的考釋，我始見到這二十年中新發現的北邙明器、敦煌佚籍、新疆木簡的圖像，我始知道他們對於古史已在實物上作過種種的研究。我的眼界從此又得一廣，更明白自己知識的淺陋。我知道要建設真實的古史，只有從實物上著手的一條路是大路。²⁸

半年後，當顧頡剛為《廈門大學國學研究院周刊》作〈緣起〉時，他對這種學風又有更進一步的自覺：

我們知道學問應以實物為對象，書本不過是實物的紀錄。我們知道如果不能瞭解現代的社會，那麼所講的古代社會便完全是夢囈。所以我們要掘地看古人的生活，要旅行看現代一般人的生活。任何骯髒和丑惡的東西，我們都要搜集，因為我們的目的不是求美善，乃是求真。²⁹

時隔一年，顧頡剛復為新創立的《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周刊》撰寫〈發刊辭〉，在其中他對這種學風又有更加完整清楚的體認：

我們要實地搜羅材料，到民眾中尋方言，到古文化的遺址去發掘，到各種的人間社會去採風問俗，建設許多的新學問！³⁰

長久以來，臺灣的學術界一直認為這篇〈發刊辭〉是出自傅斯年的手筆³¹，但在顧頡剛的日記中卻清楚地記錄著顧頡剛在1927年10月21日「作《研究所周刊》發刊詞」³²，因此該文作者究竟何屬的公案應該是水落石出，無庸再爭辯了。³³

²⁸ 顧頡剛：〈古史辨第一冊自序〉，《顧頡剛古史論文集》，第1冊，頁48-49。

²⁹ 此文撰於1926年12月28日，引文見顧潮：《顧頡剛年譜》，頁133-134。相關討論另參顧潮：〈顧頡剛先生與史語所〉，《新學術之路》，上冊，頁88。

³⁰ 引文見顧潮：《顧頡剛年譜》，頁145。

³¹ 這個印象是董作賓（1895-1963）所造成的，董氏早在1951年所撰就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在學術上的貢獻——為紀念創辦人終身所長傅斯年先生而作〉一文即持此說。董氏此文刊於《大陸雜誌》2卷1期。

³² 顧頡剛：《顧頡剛日記》，第2卷，頁97。

³³ 關於該公案的相關討論請參顧潮：《歷劫終教志不灰》，頁120；顧潮：〈顧頡剛先生與史

雖然這篇〈發刊辭〉是由顧頡剛所執筆的，但仍有學者認為此文「鮮明地表現了傅斯年的學術理想和目標。」³⁴有的甚至武斷地認定其中某些觀念「絕對是『傅斯年式』的，不是顧頡剛的蹤影。」³⁵這些學者的看法恐都失於一廂情願與片面。學術觀念往往都是相互激盪的，特別是在一個大的時代思潮氛圍感染下，觀念的傳播與流行尤其迅速，而其在學人圈中所生發的作用與影響亦特別顯著。因此持平來說，與其說〈發刊辭〉中的種種觀念是僅代表顧頡剛或傅斯年某個人的想法，不如說是呈現出了二人的共同立場。³⁶

顧頡剛這種重視實地考察的治學態度一直沿續到 1930 年代在北平的學術事業。在 1937 年 4 月 1 日出版的《禹貢半月刊》「三周年紀念號」中，他在經其修改的〈本會此後三年中工作計畫〉一文中，仍一再強調實地考察的重要：

語云「百聞不如一見」，誠以尋討事理，書本之誦求不如實際之調查，是以本會對於旅行調查最為重視。³⁷

顧頡剛所倡導的這種實地考察的學風在當代學術上的意義，也為當時其他領域的學人所深刻的認知。其時留學英國，師從功能派文化人類學大師馬林諾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 1884-1942）的費孝通（1910-2005）就曾在其函寄顧頡剛的書簡中大力讚揚這種學風：

一切知識最可靠者惟有目擊身受，自然科學之實驗可貴在此，社會科學之實地研究不可缺少之理亦在此。此風不可不提倡，而尤

語所），《新學術之路》，上冊，頁 87；杜正勝：〈無中生有的志業——傅斯年與史語所的創立〉，《新學術之路》，上冊，頁 12-13。

³⁴ 遼耀東（1933-2006）：〈傅斯年與歷史語言研究所〉，《胡適與當代史學家》（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8 年），頁 235。

³⁵ 杜正勝：〈無中生有的志業——傅斯年與史語所的創立〉，《新學術之路》，上冊，頁 12-13。例如在這篇〈發刊辭〉中所宣示的治學態度是「沒有功利的成見，知道一切學問都不是致用的。」就不能說沒有顧頡剛的蹤影。其實顧頡剛早在 1922 年就曾針對整理國故的問題提出應「研究」，而非「實行」的態度。此外，他在 1928 年 12 月下旬為籌辦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展覽會所作的〈說明書〉中的〈卷頭語〉裏，他也明確的指出：「學問必須脫離了應用的束縛纔可望自由的發展，這是我們信仰的第一義。」（以上分別見顧潮：《顧頡剛年譜》，頁 75、頁 166。）由此，如何能說這「絕對是『傅斯年式』的」觀念？又如何能說是「鮮明地表現了傅斯年的學術理想和目標」？相關討論請另參王汎森（1958-）：《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3 年），頁 389-390、頁 408。

³⁶ 顧潮：《歷劫終教志不灰》，頁 120；顧潮：〈顧頡剛先生與史語所〉，《新學術之路》，上冊，頁 87。

³⁷ 《禹貢半月刊》，第七卷第一二三合期，頁 14。

貴能自身作則。吾師（案：指顧頡剛）處學術前驅，後生所仰，能以辨古察今打成一片，中國社會科學之前途實利賴之。³⁸

當然顧頡剛重視實地調查活動，並致力將其發展為學術考察事業，除了有來自上述他對實地考察學風的認識外，其個人好遊歷的個性興趣與嗜好也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顧頡剛對遊歷之喜好屢見諸他的筆墨中，如其於〈古史辨第一冊自序〉云：

我在學校裏最喜歡做的事情是「修學旅行」，因為史地教員對於經過的名勝和古蹟有詳細的說明，理科教員又能伴我們採集動植物作標本；回來之後，國文教員要我們作遊記，圖畫教員要我們作記憶畫。³⁹

又如其於《辛未訪古日記》中亦云：

予自幼好遊覽，不知此性之何自來，偶得聞暇，輒涉歷山水以開廣其心。……其後居北方，力所能至，無不往者，近郊遠邑，都作盤桓，匪特賞其風物之美，羅煙霞泉石為吾狎友，亦欲藉以接觸民間生活，識國家之現實情狀，不使欺蒙於現代化之城市外衣。⁴⁰

結合客觀求真的考索精神與個人嗜好遊覽的興趣，以及夾雜其中的憂國憂民的胸懷，顧頡剛的學術之路很自然地朝向實地考察的方向發展，而從此這個方向也就成了他的學術事業的重心之一。

三、田野中的古跡古物調查

顧頡剛早年的學生，同時也是當年禹貢學會核心成員之一的史念海（1912-2001）曾針對顧頡剛的實地考察活動有如下的評述：

頡剛先生以學術名家，卻並非終日伏處案頭，不出戶庭。頡剛先生亦喜游歷，其游履所至，可以說是無遠殊屆。而最為重要的應為三次：一次是到河北大名，探問崔東壁的故里；一次是到內蒙

³⁸ 《禹貢半月刊》，第七卷第一二三合期，〈通訊一束〉，頁401。

³⁹ 顧頡剛：〈古史辨第一冊自序〉，《顧頡剛古史論文集》，第1冊，頁12。

⁴⁰ 顧頡剛：《辛未訪古日記》，頁221。

古後套，訪問王同春所開鑿的渠道；再一次是到甘肅南部和青海東部，考察教育。⁴¹

顧頡剛一生的遊歷與考察活動確實非常頻繁，吾人主要根據顧潮所編的《顧頡剛年譜》，另又參酌沈津（1945-）所編的《顧廷龍年譜》，⁴²約略將其從 1918 年初遊角直保聖寺，參觀楊惠之所塑之羅漢像開始，直至 1945 年抗戰結束止，他在這段期間所從事的學術考察活動以及帶有考察性質的遊歷活動做一整理，並編製了〈顧頡剛考察年表：1918—1945〉（見附錄）。從其中可以發現在這二十八年間，他一共至少參與了 66 次的考察活動或帶有考察性質的旅遊活動，平均一年 2.35 次。這還不包括他藉由外出工作、演講、出差、開會、省親、處理私人事務以及一般性的旅遊等機會所可能同時伴隨的考察活動。

在這 66 次跟他有關的考察活動中，他親身參與的共有 58 次，另外 8 次則是由他組織了考察團，但他本人並未實際參與考察。⁴³從〈考察年表〉中也可以清楚的看到，顧頡剛考察事業的高峰是在 1929 年返回北平任教於燕京大學後才開始的。從 1929 年秋至 1937 年七七抗戰前夕的八年間，他所參與及組織的考察活動一共有 27 次，平均一年 3.37 次，這個比例遠高於 1918 年至 1945 年間的考察活動平均值。如果扣除其中 7 次未親身參與的考察活動，他在這八年中也參與了 20 次的考察活動，平均一年也有大約 2.5 次到田野考察遊歷的機會。由此也可以知道，在這些年的忙碌歲月中，顧頡剛確實是經常奔波於鄉野田里間。這也意味著他從事學術研究工作的場域已經從書房或研究室搬移至田野中了。

在顧頡剛活躍於抗戰前的北平學術圈的期間，他的學術考察事業的重心也已由 1929 年之前的民俗考察轉移至古跡古物調查及邊疆史地的考察。由於後者涉及

⁴¹ 史念海：〈顧頡剛創立禹貢學會及其以後的二三事〉，《顧頡剛學記》（顧潮編，北京：三聯書店，2002 年），頁 388。

⁴² 沈津：《顧廷龍年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

⁴³ 這 8 次是 1928 年 7 月的組織中大研究所赴滇調查少數民族事，派史祿國（S.M. Shirokogoroff, 1887-1939）、楊成志（1902-1991）等前往。又派容肇祖赴北路考察古物；1935 年 7 月 1 日任職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歷史組主任後，派吳世昌（1908-1986）、張江裁（1909-1968）帶隊普查北平古跡；1936 年 7 月，應王喆之邀，在禹貢學會組織河套水利調查團前往調查；1936 年 11 月，禹貢學會組織張維華（1902-1987）、馮家昇（1904-1970）、侯仁之（1911-）、陳增敏赴察哈爾省調查蔚縣古石刻；1937 年 4 月 4 至 16 日，應綏遠當局邀，在燕大組織綏遠蒙旗考察團，赴綏遠各旗盟調查；1937 年 4 月，在燕大歷史學系組織汴洛考古旅行團，去洛陽、開封等地調查古物古跡；1937 年 6 月，在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組織燕趙古跡調查團，赴河北邯鄲、定縣、易縣，實地測繪調查趙王城、漢中山王陵寢、燕下都；1937 年春間，西北移墾促進會、河北移民協會、燕京大學聯合組織暑期西北考察團。

到當時實際的政治、社會及民族的問題，事涉複雜，且亦超出本文的範圍，因此本文的討論將只侷限在古跡古物的調查活動方面。在古跡古物調查及邊疆史地考察二者之間，顧頡剛很早就表現出對古跡古物的關注。從〈考察年表〉中可知，早在 1918 年顧頡剛就已經在一次旅遊蘇州古鎮甪直的活動中，對當地古剎中的唐朝塑像產生興趣，此後在北大研究所期間又有數次親身調查古跡文物的經歷。正是因為有這些實際參與的經歷，也難怪他在 1929 年重返北平校園後，馬上就迫不及待地開展古跡文物的學術考察活動。據《年譜》記載，顧頡剛在來到燕京大學的第一個學期即與容庚合擬〈古迹古物調查計劃書〉，計畫進行河北、河南、山東、山西四省之訪古。⁴⁴而在隔年的夏末，他又與容庚籌備古跡古物調查事。⁴⁵他這個計畫直到 1931 年的 4、5 月間方正式付諸實現，這就是有名的「辛未訪古」。這次訪古之行的緣起據顧頡剛在十餘年後的追憶，係因其來到燕大任教之後，讀書研究「致力過猛」而得到「怔忡之疾」，以致「每一握管，胸懣心浮」。為了排遣這種「不能事筆札」的後遺症，因此遂有這次的旅行訪古之舉。⁴⁶但這次看似偶發的旅行活動，卻應該是經過長期的思考與縝密的計畫，否則不可能說走就走。且他所行經的路線，除了以陝西取代山西外，其他皆大致與 1929 年年底和容庚合擬之〈古迹古物調查計劃書〉相合。

由此可知，顧頡剛這次的訪古之旅應是有計畫的活動，當時他為此組了一支旅行團，名稱叫做「燕大考古旅行團」。正式的團員除顧頡剛外，還有容庚、鄭德坤（1907-2001）與林悅明（1908-1996）。燕大教授洪業（1893-1980）與吳文藻（1901-1985）則藉春假之機亦同行。團員們的分工是：容庚司會計、顧頡剛司紀錄、鄭德坤司庶務、林悅明司攝影。所到之處有河北之定縣、石家莊、正定、邯鄲、魏縣、大名，河南之彰德、安陽、鄭州、洛陽、陝州、開封、鞏縣，陝西之潼關、西安，山東之濟寧、嘉祥、曲阜、泰安、濟南、龍山、臨淄、益都、青島等。5 月 29 日返抵北平，共「歷時兩月」。其中去魏縣、大名，則為專訪崔述（1740-1816）故里。⁴⁷史念海所說的 3 次重要考察之一的河北大名崔東壁故里之行僅僅是這「歷時兩月」的訪古活動中的一個行程而已。

此後直至 1936 年，顧頡剛又進一步將古跡古物調查活動延伸至大學中的正規課程。據《年譜》記載，顧頡剛在 1936 年的 7 月與燕大校方商議增設古物古跡調

⁴⁴ 《年譜》1929 年 12 月 1 日條下記，頁 177。

⁴⁵ 《年譜》1930 年夏末條下記，頁 188。

⁴⁶ 見顧頡剛：《辛未訪古日記·序》，頁 222。案此篇序寫於 1946 年 5 月 15 日。

⁴⁷ 以上參顧頡剛：《辛未訪古日記》；顧潮：《顧頡剛年譜》，頁 192-193。

查實習課。這個構想獲得燕大校方的同意，因此在同年 9 月的新學期開始，他就與容庚、李榮芳正式在燕大歷史系合開「古迹古物調查實習」課。開設這門課的目的在養成學生自動搜集材料之興趣，俾所學不受書本限制。具體的做法係利用周六下午參觀北平各處古跡，並乘周日之便，到涿州、張家口、宣化參觀。大概這個課程頗受歡迎，因此不久之後清華大學歷史系的師生亦一起加入。⁴⁸此後，這個課程又在 1937 年的 1 至 6 月間的學期中開設過，同樣率領學生調查北平城內及四郊之古物古跡，稍遠則至昌平、房山、妙峰山等處，更遠則至洛陽、開封等地。直至抗戰期間，他依然在成都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開設「古物古迹調查實習」課，並亦曾帶領學生調查新都、新繁等處古跡。⁴⁹

綜觀顧頡剛所從事的古跡古物調查活動，其主要成就與貢獻大致可從以下五個面向來說明。

（一）文物與文獻資料的蒐集與調查

顧頡剛組織辛未考古旅行團的主要目標有二：為燕大校中之圖書館與博物館搜購文物，一也；調查當時飽受天災人禍之歷史文化的遺存之損失及現狀，二也。⁵⁰搜集文物與調查古跡可說是一般古跡文物考察活動最基本的目標。因此，燕大考古旅行團所設定的考察目標本也無甚出奇之處。不過，對顧頡剛來說，辛未訪古之旅卻另有特別的任務，即趁道前往大名調查崔述故里，並希望能對崔述舊稿有所新發現。⁵¹據顧頡剛云，這趟大名之行是洪業發起的。⁵²雖然此行對此沒有什麼收獲，⁵³但卻也憑弔了崔氏墓地和家宅遺址，參觀崔氏門人陳履和（1761-1825）於嘉慶 24 年（1819）所書的墓碑以及崔氏遺物（崔氏家譜及存疑的崔東壁像），並且還瞻仰了崔述的讀書之堂。他們一行人亦曾徘徊於被漳水湮沒的魏縣故城⁵⁴，

⁴⁸ 以上參顧潮：《顧頡剛年譜》，頁 255、257。

⁴⁹ 以上參顧潮：《顧頡剛年譜》，頁 265、301。

⁵⁰ 顧頡剛：《辛未訪古日記·序》，頁 222。

⁵¹ 參洪業、顧頡剛：〈崔東壁先生故里訪問記〉，《崔東壁遺書》（臺北：世界書局，1963 年），第 1 冊，前編，頁 1；洪業：〈崔東壁菽田騰筆之殘稿〉，《洪業論學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頁 112。

⁵² 顧頡剛：〈崔東壁遺書序〉，《崔東壁遺書》，第 1 冊，前編，頁 3。

⁵³ 洪業：〈崔東壁菽田騰筆之殘稿〉，《洪業論學集》，頁 112。

⁵⁴ 以上俱參洪業、顧頡剛：〈崔東壁先生故里訪問記〉一文及顧頡剛：《辛未訪古日記》，頁 234-241。相關敘述另參鄧雲鄉（1924-1999）：〈顧頡剛與崔東壁〉，《雲鄉話書》（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 年），頁 253-255；鄧雲鄉：〈顧頡剛大名訪古〉，《雲鄉漫錄》（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 年），頁 211-213。

「想見他自幼至壯的生活狀態」。⁵⁵這些不完全是書面文獻資料的考察收穫，其學術價值不一定會比純粹文獻資料來得低，至少可以幫助吾人更親切地認識崔述其人其學。

除了調查崔述故里之外，顧頡剛此行在調查文物文獻方面也有不錯的收穫。例如，他在5月10日那天，由張維華陪同，來到山東省會濟南的山東省立圖書館參訪。這座圖書館位於大明湖畔，當時主持館務的是知名文獻學家王獻唐（1896-1960）。王獻唐帶他參觀了館內珍藏的二十石漢畫像、馬國翰（1794-1857）玉函山房所藏古錢、漢代畫像題字、殘墓甗、封刻石，以及珍貴的善本書（如李文藻〔1730-1778〕的手稿、桂馥〔1736-1805〕《晚學集》底稿及海源閣舊藏黃丕烈〔1763-1825〕所校書）等。王獻唐主持館務雖僅二年，然搜羅昔人著作底稿已近百種，顧頡剛對王獻唐「勇猛精進」的作為大表嘉賞，稱頌此館不出數年必將巍然為北方文化重鎮。⁵⁶

（二）考察成果的展示與公佈

顧頡剛的古跡古物調查活動不但極有計畫，而且也對考察所得之展示與公佈頗為講求。在辛未訪古活動中，顧頡剛一行人攝影了二百幀照片，歸來後即與旅行團同人編此行所攝照片目錄，並於6月間在燕大校內舉辦照片展覽會。⁵⁷顧頡剛也沒忘記紀錄的職責，在那年的暑假中將考察紀錄「排日作記」、「兼旬始訖」，此即《辛未訪古日記》一書之作也。此外，此行同去的鄭德坤回校後，亦將收集得的文物整理陳列，並與人合著《中國明器》一書，為其師顧頡剛編入《燕京學報專刊》第一冊。鄭德坤又就各地見聞筆記，寫成英文報告，亦為其師洪業選刊為《燕京學報附錄》。⁵⁸

顧頡剛對考察成果之刊佈極為有效率，除其自作之《辛未訪古日記》與《西北考察日記》二書外，他於1935年任職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歷史組時，曾組織吳世昌、張江裁帶隊普查北平古跡，以大小廟宇為重點，後來分別編成《北平歲時志》、《北平史迹叢書》、《北平廟宇通檢》等書，均由北平研究院出版。又於1935年9月間與北平研究院考古組主任徐炳昶（1888-1976）到河北磁縣南北響堂寺及邯鄲、邢臺、曲陽等處，為該院搜集拓片。後來不但在年底時

⁵⁵ 顧頡剛：〈崔東壁遺書序〉，《崔東壁遺書》，第1冊，前編，頁3。

⁵⁶ 顧頡剛：《辛未訪古日記》，頁294-296。

⁵⁷ 顧頡剛：《辛未訪古日記·序》，頁222；顧潮：《顧頡剛年譜》，頁193。

⁵⁸ 鄭德坤：〈紀念顧頡剛師〉，《顧頡剛先生學行錄》，頁102。

舉辦響堂拓片展覽，而且參與考察同人也編成《南北響堂寺及其附近石刻目錄》一書。⁵⁹

（三）有意識地將古跡古物調查提升為一門專業的課程

顧頡剛這麼做的目的除了前述之養成學生自動搜集材料的興趣，俾所學不受書本限制之外，應該還有將調查活動予以理論化、學術化與專業化的企圖，如此才可以達到更好的經驗傳承效果。關於這門在當時堪稱別開生面的課程，那時曾經擔任顧頡剛助教的侯仁之是如此評述的：

從 1936 年 9 月到 1937 年 6 月，顧頡剛教授別出心裁地開設了一門課，叫做「古迹古物調查實習」，每兩個星期的星期六下午，要帶學生到他事先選定的古建築或重要古遺址所在地，或在北京城內，或在城外近郊，進行實地考察。⁶⁰

又說：

按規定，每兩個星期就要利用周末的時間進行一次現場實習，主要是在北平城內和郊外，有時還利用假期較長的時間（如國慶節和春假）有目標地奔赴外地。我的主要任務是每次確定調查目標之後，如某處的古建築、某處的古園林以及某處的考古發現或古迹古物等，頡剛師就向我提供一些必要的參考資料，再加上我自己搜集所得，先寫成一篇簡要的介紹書，事前要鉛印出來，在出發前發給學生，人手一份，作為到現場調查時的參考。……可是僅憑文字記載，常常出現錯誤，來到現場對比實迹實物的時候，往往會發現我所根據的資料不盡可靠，也有時是調查對象本身已經發生了變化。……這使得我深深體會到現場考察是多麼重要。⁶¹

⁵⁹ 以上分別參顧潮：《顧頡剛年譜》，頁 233-234、頁 238；吳豐培（1909-1996）：〈記 1935-1937 年的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顧頡剛先生學行錄》，頁 164-165。

⁶⁰ 侯仁之：〈我從燕京大學來（代序）〉，《燕京大學人物誌》（北京：燕京研究院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 年），第一輯，頁 4。

⁶¹ 侯仁之：〈師承小記〉，《顧頡剛先生學行錄》，頁 131。相關敘述又參侯仁之：〈山高水長何處尋——追憶頡剛師二三事〉，《顧頡剛先生學行錄》，頁 134；李固陽：〈顧頡剛先生在燕京大學〉，《顧頡剛先生學行錄》，頁 92。

這樣的教學效果肯定是良好的，因為不但吸引了清大的師生加入，而且這門課還於次年持續開設下去，甚至直到抗戰內遷至成都時，他依然在物質條件遠遜戰前北平的情況下，在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開設這門課。

（四）喚醒社會對古蹟文物的重視

《開明書店二十周年紀念文集》中有一段簡介《辛未訪古日記》內容的文字，其云：

黃河流域為東方文化之搖籃地，地面之堆積與地下之蘊藏多至不可勝計，……作者此文，足為游者嚮導。至於破壞之後如何保存，各種材料如何整理，則更為國人應負之使命，此文亦可為此種工作之前奏曲也。⁶²

顧頡剛對於古蹟之遭受破壞，珍貴的文物遭到盜賣的情況是極感痛心疾首的，他嘗感歎先民之遺產，「或建築之偉，或雕刻之細，或日用器皿之製造，或文字圖書之記錄」，莫不使其睹之而驚心動魄，由此更歎服「祖宗貽我之厚如此」！但他對這些古蹟文物在民初以來的二三十年間所受到的急劇破壞，卻深懷著「及我之身將淪胥以鋪」的恐懼心情。他批判當時「主軍政者方假破除迷信之名以行其聚斂掊克之術」，從而使「一二千年之古剝古物不為黃巢李闖及遼金胡元所摧毀者乃悉銷散於民國」。以致使顧頡剛不禁心生「我寧畢世不見新出土之古物，以待太平之世我曾孫玄孫之發掘，不願其今日顯現而明日漸滅也」的憤懣念頭。⁶³面對這種情況，身為一位知名的學者，顧頡剛也只能透過他的筆來喚醒社會各界重視古蹟文物保存的問題。如其於《辛未訪古日記》中提及河北正定隆興寺（俗稱大佛寺），其大佛殿中之佛像與塑壁，莊嚴燦爛，懾人心目。大佛金身七丈二尺，殿高逾八丈，然顧頡剛等人造訪時，殿頂已塌。此大佛殿既無頂，於是便出現了當顧頡剛等人坐殿外石階進午餐時，「此大佛乃似探首屋外窺觀我輩飲食然者」的滑稽場面。顧頡剛由是沈痛的呼籲：「倘更不修葺，數年後四壁盡倒，則此佛將為獨立荒郊之翁仲矣！」⁶⁴

雖然不易評估顧頡剛的努力究竟收到多少實質的成效，但顧頡剛早年投注在蘇州保聖寺唐朝楊惠之塑像的保存工作，卻獲得頗為不錯的成果。他曾於 1923

⁶² 顧頡剛：《辛未訪古日記》，未標頁碼。

⁶³ 顧頡剛：《辛未訪古日記》，頁 223-224。

⁶⁴ 以上俱見顧頡剛：《辛未訪古日記》，頁 228-230。

年作文投《努力周報》，為楊惠之塑像之保存向社會各界大聲呼救，後來得到蔡元培（1868-1940）、胡適、高夢旦（1870-1936）、任鴻雋（1886-1961）、葉恭綽（1881-1968）及地方人士之響應。1928年獲蔡元培支持，允由大學院助款來保存修繕塑像。⁶⁵不久之後，大學院改為教育部，部裏組織「保存用直楊塑委員會」，聘蔡元培、葉恭綽、陳萬里及顧頡剛等18人為委員，辦理保存事宜。一直到1932年底，保護楊惠之塑像的工作終於得到落實，該年10月底，顧頡剛接獲葉恭綽的來信，得知用直保聖寺古物館將於11月12日開幕。歷經十年的努力，顧頡剛不禁欣喜地在10月31日的日記中寫下如此的字句：「保存舊塑竟成功了！」⁶⁶

（五）與經史古籍記載相印證。

《開明書店二十周年紀念文集》對《辛未訪古日記》之簡介又有一段話頗能道出顧頡剛考察古蹟文物的重要意義：

欲瞭解中國歷史與其文化之演進者必須親蒞其處，乃得有親切之認識。⁶⁷

顧頡剛的學術專業在古史，於經史古籍的相關記載尤為敏感。他在考察古蹟古物的同時，也會不斷地將考察聞見所及與經史古籍相印證，今茲舉數例以略見一斑。

如其在辛未訪古行程中，離開潼關，來到河南靈寶，見其西門外大道旁有石碑二座，一書「老子著經處」，一書「猶龍真窟」，均為明人所題。顧頡剛對此頗不以為然的說道：「明人好事，必指實其地以為快。」他認為與其在城門題此二碑，不如在關門更來得合理。⁶⁸

又例如他從山東濟寧往返嘉祥的途中，因天雨以致地面泥濘不堪，「泥土黏力甚強，足拔起時，鞋常不能與之同起，一步一頓，有如蒼蠅之在蒼蠅紙上然」。及至某村，道上又多油垢，「滑甚，常欲傾跌，念一跌便爬不起矣」。由此忽讓他聯想到《史記》記載陳勝、吳廣赴役驪山，天雨失期，秦法當斬，遂起叛秦之

⁶⁵ 以上參見顧潮：《顧頡剛年譜》，頁84、167。

⁶⁶ 以上敘述參顧潮：〈顧頡剛先生與用直保聖寺塑像〉，收入錢理群、嚴瑞芳主編：《我的父親與北京大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333-334。又相關研究請參王汎森：〈什麼可以成為歷史證據〉，《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香港：三聯書店，2008年），頁206-209。

⁶⁷ 顧頡剛：《辛未訪古日記》，未標頁碼。

⁶⁸ 顧頡剛：《辛未訪古日記》，頁268。

事。顧頡剛由己之切身經驗省悟到「彼輩既有叛秦之勇氣何以更無冒雨之勇氣，今乃知冒雨之難有過於叛秦」的道理。⁶⁹

又如其至山東臨淄，發現當地農產不茂，人煙稀少，城垣周僅三四里，其四分之三盡為田畝而非住宅，城中居民亦只數百戶，渾不似《戰國策》蘇秦向秦王遊說時所說的：「臨淄市中，車擊轂，人摩肩，連袂成帷，揮汗成雨」的繁華景象。撫今追昔，不禁讓顧頡剛為之惘然。⁷⁰

又例如他到山東東部的嶗山遊覽，他觀察嶗山「周二百七十里，為海濱大山」。於是就乘便結合經史，為此山的名稱及意義做了一番考證。他首先舉出《史記·秦始皇本紀》「始皇登勞盛山以望蓬萊」語來證明「嶗山」本作「勞山」，「今俗加山旁作嶗耳」。復又引用《詩經·小雅·漸漸之石》「山川悠遠，維其勞矣」鄭玄（127-200）《箋》語來考釋勞字之意。鄭玄釋此詩云：「勞勞，廣闊。」顧頡剛認為鄭玄是高密人，距此地甚近，由此可知以廣闊為勞是當時當地之言。然何以勞山稱勞？顧頡剛又引晏謨《齊地記》「泰山自言高，不如東海勞」之語來做證明，他的結論是：在民眾情感上，「此山且有奪泰山尊嚴之勢矣」。⁷¹也就是說，從當地民眾情感的角度來看，他們可是認為嶗山是極廣闊雄偉的，一點也不輸給自以為高大的泰山。頗有登嶗山而小泰山的氣概！一座山的得名之由不但牽涉到繁複的考證，而且也關聯到當地民眾複雜微妙的情感因素。顧頡剛這個結合實地考察與經史古籍的有趣考證，看似信筆拈來，非刻意為之。但其中所涵蓄的學術義蘊卻極深遠綿長，值得細細咀嚼，反覆玩味。⁷²

⁶⁹ 顧頡剛：《辛未訪古日記》，頁 284。

⁷⁰ 顧頡剛：《辛未訪古日記》，頁 306。

⁷¹ 顧頡剛：《辛未訪古日記》，頁 320。

⁷² 類似精彩考證的例子在他從事西北邊疆史地與民族社會考察所寫的相關筆記中亦屢見不鮮，如其在 1937 年因避日寇而西走甘肅、青海一帶時所撰寫的《皋蘭讀書記》中就有好幾條筆記討論到〈禹貢〉的作者未親至隴西的問題。顧頡剛的根據是〈禹貢〉只記載「導河積石，至於龍門」，而不言「導河積石，東會于洮，又東會于湟」。因為洮水與湟水皆遠在伊、洛、瀘、澗之上，如果〈禹貢〉作者真的有到過積石的話，便不會不知道洮水與湟水了。（參《顧頡剛讀書筆記》，第 4 卷，〈禹貢作者未至洮湟〉條，頁 2040；又參〈大小積石〉條，頁 1957；〈河源〉條，頁 2044-2045。）又如他在抗戰期間所撰寫的《浪口村隨筆》，其中〈梁州名義〉一文亦是他在實地考察的親身經驗基礎上，從而對經史古籍的記載有全新的體悟，如此所做出來的考證，自然有令人倍覺親切的信服感。其云：「予比年北遊秦隴，南歷蜀滇，徘徊于梁境者久矣，深以為此州名義一經揭破，實極簡單。蓋梁有兀然高出之義：水際以堤與橋為最高，故稱堤與橋曰梁；屋宇以脊為最高，故名承脊之木曰梁；山以顛為最高，故山顛亦曰梁，梁轉聲而為嶺，今言嶺古言梁也。」（《浪口村隨筆》〔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 年〕，卷之一，頁 15-16。）

四、結論

顧頡剛在抗戰時期曾在一封致雲南大學校長熊慶來（迪之，1893-1969）的信中向他吐露了自己的治學願望：

甚望以監禁方式施之于研究室，以充軍方式施之于旅行考察，使我胸中久蓄之問題得告解決而系統之著作亦可完成，此生便無憾矣。⁷³

顧頡剛一生中無時無刻不為他的學術事業焦慮著，其學術事業表面看來繁複龐雜，多彩多姿，說到底，其核心就是他的著述。他的著述看似豐富，但他卻始終以未能寫出系統性的著作而感到若有所憾。⁷⁴這種焦灼感在他步入中年之後益發顯得強烈。正因為他的事業太過龐雜，而社會活動又多，常使得他無法靜下來好好讀書作學問。因此他才會異想天開的想出用監禁及充軍的方式來迫使自己專心致志的作研究，好早日完成系統性的著作。這雖是帶有玩笑性質的自我惕勵的話語，但從中卻不難看出旅行考察在顧頡剛的學術研究中所佔據的重要地位。

顧頡剛雖然如此強調實地考察在學術研究上的重要性，但他的學術背景和訓練仍不免令人對他從事田野工作的專業性感到好奇。當代中國考古學的奠基者李濟（1896-1979）曾對其從事的田野考古工作是如此嚴肅看待的：

田野考古工作，本只是史學之一科，在中國，可以說已經超過了嘗試的階段了。這是一種真正的學術，有它必需的哲學的基礎，歷史的根據，科學的訓練，實際的設備。田野考古者的責任是用自然科學的手段，搜集人類歷史材料，整理出來，供史學家採用。⁷⁵

他又說：

田野工作是一門獨立的科學訓練，……科學的田野考古工作，所需要的這一項訓練，應該是如何的嚴肅、堅實、透徹了。這決不

⁷³ 顧頡剛：《西北考察日記》，頁32；又見於顧潮：《歷劫終教志不灰》，頁193。回信時間在1937年12月。

⁷⁴ 顧頡剛在《浪口村隨筆》的〈序〉中曾自述其這方面的心境，云：「嗚呼，予自畢業大學，立志從事古史，迄今垂三十年，發表文字已不止百萬言，而始終未出一整個系統，非不欲為，懼學力未至，徒欺人也。然而起人期望，受人責備，為日久矣。」（未標頁碼）

⁷⁵ 李濟：〈田野考古報告編輯大旨〉，《李濟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卷1，頁332。

是一種業餘的工作，可以由玩票式的方法能辦理的。……現代科學所要求的，只是把田野工作的標準，提高到與實驗室工作的標準同等的一種應有的步驟。⁷⁶

按照李濟如此嚴格的標準，顧頡剛的學術考察作為，無論是民俗考察、古跡文物調查，或邊疆史地考察，恐都不免淪於「業餘」、「玩票」的性質。其實傅斯年在剛成立史語所時，便曾要求所中派遣出的「川康民俗調查團」的成員不能只停留在隨聞隨錄，或風俗軼話的層次，而應該注意發掘問題、要多照相。其目的也就是想將其提升到現代學術的層次，而不只是傳統文人「記遊」類作品的延續。⁷⁷有趣的是，傅斯年所反對的記遊式的考察作品，卻正是顧頡剛所優而為之的表現方式。當年二人在廣州中山大學決裂，以致破口相罵的導因之一便恰好是傅斯年鄙薄顧頡剛所主導出版的《民俗學會叢書》，傅譏評其所出的書不是「這本無聊」，就是「那本淺薄」。⁷⁸不知若傅斯年看到顧頡剛《辛未訪古日記》或《西北考察日記》等不免多少仍帶有「隨聞隨錄」、「風俗軼話」性質的記遊類作品時，他會作何反應？

當然，用深受當代西方學術影響的傅斯年、李濟等人所揭櫫的田野考察方法來看待顧頡剛的考察工作未必公允，因為他所從事的既非考古學，亦非人類學，而這兩門純粹來自西方的學問，其最主要的研究方法就是田野工作。⁷⁹顧頡剛所專精的是傳統的以經史為核心的人文學術，故其研究方法仍是以文獻資料之探索為主。對考古學者與人類學者來說，田野工作是他們從事學術研究必須要使用的方法，非如此不能進行研究工作。但對於像顧頡剛這樣以經史古籍為專業領域的學者，田野考察就非必要不可的研究方式。顧頡剛願意跨出書齋及研究室，遠離繁華舒適的城市生活，來到鄉間野外去從事艱苦的考察工作，就這點而言，他的學術見識與研究熱忱確實超越當時人文學界中的許多學人遠甚。因此，持平來說，顧頡剛的學術考察工作或許較不俱備考古學與人類學的田野工作所要求的專業與

⁷⁶ 李濟：〈中國古器物學的新基礎〉，《李濟文集》，卷1，頁336。

⁷⁷ 王汎森：〈容肇祖與歷史語言研究所〉，《新學術之路》，上冊，頁350。這次的考察成果在1929年由黎光明（1901-1946）和王元輝執筆寫出，原題作《川康民俗調查報告》，然一直未曾正式出版。直至2004年方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刊佈，改題作《川西民俗調查記錄1929》。

⁷⁸ 參顧潮：《歷劫終教志不灰》，頁124-128。

⁷⁹ 參李亦園（1931-）：《田野圖像：我的人類學生涯》（臺北：立緒文化事業公司，1999年），頁48-49。

科學性，但對一般經史學術甚或某些人文學術的研究來說，其考察成果並不因不經專業田野工作方法所獲得而減損其學術價值。

【責任編校：潘慈慧】

附錄：〈顧頡剛考察年表：1918—1945〉

（據顧潮《顧頡剛年譜》編製，又據沈津《顧廷龍年譜》增補。凡引用《顧頡剛年譜》者一概只標頁碼，不標書名，以省篇幅。本年表儘可能地收錄所有與顧頡剛考察活動有關之資料，其中包含 58 次顧氏親自參與的考察活動、8 次由顧氏所規畫、組織但他本人未親自參與的考察活動，以及其他屬於開會、著述、出版與展示性質等非實際考察的活動，這類的活動一共 6 次，三者合計共 72 項。凡顧氏未親自參與以及非實際考察之活動一律在備註欄內註明。）

	時間	考察內容	備註
1	1918 年 9 月	遊甬直保聖寺，見唐朝楊惠之所塑之羅漢像。（頁 46）	
2	1919 年 10 月 9 至 12 日	與陳萬里遊西山，至檀柘寺、戒壇寺、觀音洞、滴水岩、妙峰山、仰山、八大處，行程二百里。（頁 52-53）	
3	1919 年 10 月 19 日	與蔣仲川遊八達嶺（頁 53）	
4	1920 年 3 至 6 月	其間與蔣仲川、郭紹虞遊白雲觀、琉璃廠，與吳維清去安定門外黃寺看「打鬼」儀節，遊小湯山，又與郭紹虞遊西山各處、乘船遊護城河，又與陳萬里遊豐臺及西直門外五塔寺、極樂寺、大佛寺等處。（頁 53）	
5	1922 年 6 月 12 日	與陳萬里至甬直，次日遊保聖寺，陳萬里帶得攝影機將僅存的塑像攝了下來。（頁 73）	
6	1922 年 6 月 14 日	到昆山慧聚寺訪楊惠之所塑之天王像，然「片椽不存，悼嘆而歸。」（頁 73-74）	
7	1923 年年底	與陳萬里赴河南作考古參觀。31 日，在開封見到出土古物的全份。（頁 90）	
8	1924 年 1 月	與陳萬里遊河南開封龍亭、鐵塔、相國寺、洛陽龍門、魏古城、白馬寺、鞏縣石窟寺、鄭州、石家莊、正定隆興寺、太原晉祠、天龍山等處。（頁 91）	

9	1924年2月5日（春節）	與潘家洵到朝陽門外東嶽廟遊覽。（頁92）	
10	1924年3月14日	與容庚等人前往調查北京西山碧雲寺古建築，17日歸城。18日，與容庚合作《研究所國學門調查西山陸謨克學院發見建築物報告》。（頁93）	
11	1924年5月11日	與吳維清遊石景山、三家店，看見了幾千名去妙峰山進香的香客，進了幾個茶棚。自此以後，方始注意到在常走的幾條街巷中的牆上貼著無數香會會啟。（頁95）	
12	1924年5月31日	與北大研究所同事胡文玉、劉澄清去東嶽廟參觀。（頁95）	
13	1924年12月13日	與陳萬里及北大研究所拓碑人到圓明園，調查文源閣碑。17日，作《調查文源閣報告》。（頁101）	
14	1925年4月30日至5月2日	承北大研究所國學門風俗調查會之囑託，與容庚、容肇祖、莊嚴、孫伏園到妙峰山調查進香風俗。（頁107）	
15	1926年2月13日（春節）	與孫伏園、孫福熙、陳學昭及妻殷履安同遊東嶽廟；午夜兩點，看財神廟燒香，一夜不眠，次日天明遊覽一周方歸。（頁123）	
16	1926年2月27日	與妻殷履安及駝群社諸先生（陳垣、沈兼士、徐炳昶等）同遊天寧寺、白雲觀。次日，又與潘家洵夫婦同遊白雲觀、白塔寺。（頁123）	
17	1926年8月17日	與孫伏園同遊杭州清華山老東嶽廟，並鈔錄材料。（頁129）	
18	1926年11月	與林幽、孫伏園、容肇祖發起成立風俗調查會。（頁133）	非實際考察
19	1926年12月15日至24日	與陳萬里游泉州，此行進了不少鋪神祠，使其對泉州的土地神有一個淺近的觀察。（頁133）	
20	1927年1月17日	與容肇祖、潘家洵等離廈門，18日抵福州，遊左公祠、玉皇殿、呂祖祠等處。（頁136）	

21	1928 年上半年	與中山大學同人及家人多次遊廣州各寺廟。到光孝寺、六榕寺、張良廟、安子期廟、懷聖寺、濠畔寺、華陀廟、華林寺等處。(頁 155)	
22	1928 年 7 月	組織中山大學研究所赴滇調查少數民族事，派史祿國、楊成志等前往。又派容肇祖赴北路考察古物。(頁 156)	未親自考察
23	1928 年 9 月 22 至 25 日	與容肇祖遊彼家鄉東莞，到城隍廟、天后廟、象塔、何真廟、袁督師祠、孔廟等處，畫〈東莞城隍廟圖〉。(頁 160)	
24	1928 年 12 月 8 至 9 日	與妻殷履安、容肇祖一家、余永梁遊佛山，到袁家莊、李家莊、城隍廟、祖廟等處，始識廣東家族組織。(頁 165)	
25	1929 年 3 月 30 日至 4 月 3 日	陪同徐炳昶及瑞典人斯文赫定遊蘇州、甬直保聖寺。(頁 172)	
26	1929 年 5 月 17 至 19 日	與魏建功、徐炳昶、朱自清、周振鶴、羅香林、葛毅卿、容媛等組織「十八妙峰山進香調查團」，遊妙峰山、天太山，由白滌洲導遊。(頁 174)	
27	1929 年 8 月 10 至 11 日	陪吳維清等遊甬直保聖寺及昆山。(頁 175)	
28	1929 年 8 月 21 至 27 日	遊甬直。(頁 175)	
29	1929 年 12 月 1 日	與容庚合擬〈古迹古物調查計劃書〉，欲進行河北、河南、山東、山西四省之訪古。(頁 177)	非實際考察
30	1930 年 6 月 10 至 14 日	與常惠、魏建功等遊易縣。參觀燕故城、清西陵、臥佛寺、開元寺、清真寺、龍興觀。(頁 186)	
31	1930 年夏末	與容庚籌備古跡古物調查事。(頁 188)	非實際考察
32	1930 年 10 月 25 至 28 日	與徐炳昶、徐森玉、李書華、馬廉、魏建功、常惠、莊嚴遊房山。眾人以經歷事作回目，共得七十餘回，	

		名《房山游記》，顧頡剛作十分之七。（頁 189）	
33	1931 年 4 月 3 日至 5 月 29 日	與容庚、鄭德坤、林悅明組成之燕大考古旅行團出發，洪業、吳文藻藉春假之機亦同行。所到之處有河北之定縣、石家莊、正定、邯鄲、魏縣、大名，河南之安陽、洛陽、陝州、開封、鞏縣，陝西之潼關、西安，山東之濟寧、曲阜、泰安、濟南、龍山、臨淄、益都、青島等。5 月 29 日抵平，歷時兩月。其中去魏縣、大名，則為專訪崔述故里。（頁 192-193）	
34	1931 年 6 月	與旅行團同人編此行所攝照片目錄在校舉辦照片展覽會。（頁 193）	非實際考察
35	1931 年 11 月 5 日	與裴文中、傅斯年等遊周口店「北京人」遺址。（頁 198）	
36	1932 年 1 月 3 日	與顧廷龍、商承祚、錢穆、王庸等同遊孔廟、國子監、東岳廟。（《顧廷龍年譜》，頁 24。）	
37	1933 年 4 月 2 日至 9 日	參加燕京大學哈佛燕京社考古團，藉春假作正定隆興寺（即大佛寺）考古。同行者：博晨光、許地山、容庚等，從建築、佛像、金石、壁畫、寺史等各方面調查該寺。（頁 209）案：同行者尚有顧廷龍，見《顧廷龍年譜》，頁 30。	
38	1933 年 4 月 29 日至 5 月 1 日	與潘由笙、顧廷龍遊妙峰山。（頁 209）	
39	1933 年 5 月	應洪業邀遊雲崗石窟。同行者還有容庚、馬鑑等。（頁 209）	
40	1934 年 4 月 6 日至 15 日	與顧廷龍赴包頭。遊包頭、綏遠、大同雲崗。（頁 220）	
41	1934 年 5 月 5 日至 6 日	與顧廷龍、向達、賀昌群、王振鐸、侯仁之、李安宅、容媛等遊周口店龍骨山，觀洞穴，由裴文中、賈蘭坡等導遊。（頁 220；《顧廷龍年譜》，頁 33。）	
42	1934 年 5 月 12 日至 13 日	與王振鐸、侯仁之、張全恭遊通縣。（頁 221）	

43	1934年5月19 至20日	與燕大同學吳世昌、于道源等遊妙峰山。(頁221)	
44	1934年7月	因平綏鐵路局長沈昌欲編該路旅行指南，邀冰心任撰述，遂組織旅行團，由路局備專車，供食宿，隨處可停留遊覽。冰心夫婦約顧頡剛、鄭振鐸、陳其田、雷潔瓊等前往。7日啟行，遊土木堡、宣化、張家口、大同、口泉、豐鎮、平地泉等處。平地泉以西因水災阻隔交通，只得返轅，18日回平。(頁221)	
45	1934年8月8 日	旅行團又登程，此次同行者除上次諸人，還有容庚。17日因繼母病篤，與同人作別，乘車東返，18日抵平。(頁223-224)	
46	1935年7月1 日	始到北平研究院上班。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歷史組正式成立，主要工作有：派吳世昌、張江裁帶隊普查北平古跡，以大小廟宇為重點，編輯《北平廟宇通檢》等書；派劉厚滋任金石編纂工作；派吳豐培負責邊疆史地研究。(頁233-234)	未親自考察
47	1935年9月12 至29日	與北平研究院考古組主任徐炳昶到河北磁縣南北響堂寺及邯鄲、邢臺、曲陽等處，為該院搜集拓片。參加工作者有何士驥、劉厚滋等。年底在懷仁堂舉辦響堂拓片展覽。後編成《南北響堂寺及其附近石刻目錄》一書出版。(頁238)	
48	1935年11月	禹貢學會出版遊記叢書，第一種是李書華《黃山游記》，後陸續出版謝國楨《兩粵游記》、李書華《房山游記》、《天臺、雁蕩游記》、譚惕吾《新疆之交通》。(頁242)	非實際考察
49	1936年4月19 日	與燕大同人遊居庸關。(頁251)	
50	1936年5月27 日	與燕大同人遊妙峰山。(頁252)	
51	1936年7月	應王喆之邀，在禹貢學會組織河套水利調查團前往，成員有李榮芳、張維華、侯仁之、蒙思明、張瑋瑛。	未親自考

		該團在二十餘天調查中所獲報告書、調查表及關於河套渠道之繪圖甚多，後編為「河套水利調查專號」，在《禹貢》半月刊發表。（頁 255）	察
52	1936 年 7 月	與燕大校方商議增設地理課、古物古跡調查實習課，並請史界名人講演等。（頁 255）	非實際考察
53	1936 年 9 月	於燕大歷史系新開「古跡古物調查實習」課，與容庚、李榮芳共同擔任，目的在養成學生自動搜集材料之興趣，俾所學不受書本限制。不久清華大學歷史系師生亦加入，利用周六下午參觀北平各處古跡，並乘周日之便，到涿州、張家口、宣化參觀。（頁 257）	
54	1936 年 10 月 4 日	與顧廷龍、聞一多、劉壽民、容庚、聶崇岐、侯仁之、張偉瑛、張西堂等以及清華學生遊涿州。（《顧廷龍年譜》，頁 55。）	
55	1936 年 11 月	禹貢學會組織張維華、馮家昇、侯仁之、陳增敏赴察哈爾省調查蔚縣古石刻。及至察省教育廳，乃知石刻散在各處，即改道赴懷安觀漢代漆器，陳增敏又獨赴大同、宣化考察盆地。（頁 262）	未親自考察
56	1937 年 1 至 6 月	仍任燕大歷史學系「古物古跡調查實習」課，清華歷史系亦加入。率學生調查北平城內及四郊之古物古跡，稍遠則至昌平、房山、妙峰山等處，更遠則至洛陽、開封等地。（頁 265）	
57	1937 年 4 月 4 至 16 日	應綏遠當局邀，在燕大組織綏遠蒙旗考察團，由歷史、社會、新聞三系學生參加，社會學系教授李安宅率隊，赴綏遠各旗盟調查，清華亦有數人加入。（頁 272）	未親自考察
58	1937 年 4 月	在燕大歷史學系組織汴洛考古旅行團，去洛陽、開封等地調查古物古跡。（頁 272）	未親自考察
59	1937 年 6 月	在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組織燕趙古跡調查團，成員有吳世昌、劉厚滋、王振鐸等。赴河北邯鄲、定縣、易縣，實地測繪調查趙王城、漢中山王陵寢、燕下都。	未親自考察

		11日，到火車站為調查團送行。（頁275）	
60	1937年春間	西北移墾促進會、河北移民協會、燕京大學聯合組織暑期西北考察團。7月1日，考察團出發，以病發燒未得同行。（頁276）	未親自考察
61	1937年8月21日	得管理中庚庚款董事會杭立武來電，囑往甘、青、寧三省考察教育。9月29日抵蘭州（頁278），1938年9月9日離蘭州。（頁289）	
62	1938年11月15日	與費孝通至祿豐，參觀學校、寺廟，調查趕街及夷人村落。（頁290）	
63	1939年7月22日至24日	與徐炳昶、方國瑜、方耀仙遊盤龍山、天女山、金沙山等處。（頁295）	
64	1940年1月上旬	與黎光明等至灌縣遊青城山及都江堰。（頁296）	
65	1940年5月6日至10日	在四川郫縣遊望帝叢帝陵、劉公墓、何武墓等處。（頁299）	
66	1940年9月至年底	在成都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開設「古物古迹調查實習」課；9、10月間，與諸生調查新都、新繁等處古跡。（頁300-301）	
67	1940年11月3日	與錢穆等遊郫縣望帝叢帝陵、何武墓、郫筒井、溫公誕生地、子雲故里等處。（頁301）	
68	1940年12月	應四川省政府古物保存委員會邀到外縣視察古物古迹。19日，至雙流，遊蠶叢祠、文昌宮等處。21日，至新津，遊觀音寺、木魚山漢墓等處。24日，至邛崃，遊天慶寺、鶴林寺等處。（頁302）	
69	1941年1月初	在大邑遊普陀庵、文昌宮、老君殿、城隍廟等處。（頁303）	
70	1941年3月	遊新都、新繁、彭縣等處。（頁304）	
71	1943年3月底至4月初	與中國史學會同人遊北碚、合川、釣魚城等處。（頁314）	
72	1945年4月	參加楊家駱主持之大足石刻考察團，24日出發，先後至合川、銅梁、大足，觀漢墓及唐宋造像。歸途經壁	

	山。考察團成員還有馬衡、何遂、莊嚴等十餘人。（頁321）	
--	------------------------------	--

主要參考書目

與顧頡剛有關之論著

- 顧頡剛、譚其驥編輯：《禹貢半月刊》，北平：禹貢學會，1934-1937年。
- 顧頡剛：《辛未訪古日記》，收入葉聖陶編：《開明書店二十週年紀念文集》，北京：中華書店，1985年。
- 顧頡剛：《西北考察日記》（與王樹民《隴遊日記》合輯為《甘青聞見記》），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8年。
- 顧頡剛：《浪口村隨筆》，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
- 顧頡剛：《顧頡剛古史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
- 顧頡剛：《顧頡剛讀書筆記》，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年。
- 顧頡剛：《顧頡剛民俗學論集》，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年。
- 顧頡剛：《顧頡剛日記》，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7年。
- 顧潮：《顧頡剛年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
- 顧潮：《顧頡剛評傳》，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5年。
- 顧潮：《歷劫終教志不灰——我的父親顧頡剛》，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
- 顧潮編：《顧頡剛學記》，北京：三聯書店，2002年。
- 鄭良樹：《顧頡剛學術年譜簡編》，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87年。
- 王學典、孫延杰：《顧頡剛和他的弟子們》，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0年。
- 王煦華編：《顧頡剛先生學行錄》，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 余英時：《未盡的才情——從顧頡剛日記看顧頡剛的內心世界》，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7年。

其他

- 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3年。
- 王汎森：《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香港：三聯書店，2008年。
- 王鍾翰：《王鍾翰清史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
- 李濟：《李濟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 李亦園：《田野圖像：我的人類學生涯》，臺北：立緒文化事業公司，1999年。
- 杜正勝、王汎森編：《新學術之路》，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年。
- 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臺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2004年。
- 余英時：《現代學人與學術》，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
- 沈津：《顧廷龍年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 洪業：《洪業論學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 童教英：《從煉獄中升華——我的父親童書業》，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
- 彭明輝：《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5年。
- 遼耀東：《胡適與當代史學家》，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8年。
- 鄧雲鄉：《雲鄉話書》，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 鄧雲鄉：《雲鄉漫錄》，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審查意見摘要

第一位審查人：

就評論人的知識範圍而言，本文是第一篇專題探討顧頡剛的古跡古物調查活動的研究文獻，應有開風氣的意義；全文論證，亦堪稱自成一說，確有一定的學術意義和貢獻。

本文以「文物與文獻資料的蒐集與調查」等五個方面，述說了顧頡剛古跡古物調查活動之成就與貢獻，大體為確論；不過，此等論述，稍嫌流於表面，是否能從更為具體與深入的方面進行述說，則可一覘顧頡剛組織發動考察活動對其本人（與參與其事者），透過此等活動而獲致的學術成果，並可具體展現他們參與這些活動所獲致的認識。

第二位審查人：

本文敘述顧頡剛田野考察中的古跡古物調查活動，此為一般討論顧頡剛學術較易忽略的部分。作者在資料蒐集上甚為費心，故而史料堅實，內容妥切深刻。尤可貴者為作者勇於提出個人之學術見解，如對〈國立中山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周刊·發刊辭〉的考訂與說明，正面討論各學者之說法，並提出作者個人肯綮之見解。

本文重點為田野考察中的古跡古物調查，但實質考察的內容，在本文中敘述較少，而逕提出顧頡剛古跡古物調查的成果與貢獻，形成有結論無過程之現象，作者或許可以多敘述顧頡剛古跡古物調查的內容與過程，再導出其成果與貢獻，會更具說服力。

